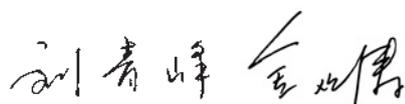


楊振寧先生、《二十一世紀》 和我們



2022年是令人沮喪的。在新冠肺炎(COVID-19)流行第三年，中國因防疫再一次與世界隔離。舉世關注的俄烏戰爭，從早春打到入秋。安倍晉三被槍擊身亡，日本修憲似乎不可阻擋。氣候反常，酷暑席捲全球。7月中旬，鬱悶中突然看到韋伯太空望遠鏡(JWST)傳回的第一批太空圖像，讓我們從世俗紛爭中抬起頭來，再一次仰望星空。難道世界已經忘卻了那些人類曾經有過的共同追求與合作精神了嗎？當價值理想與現實發生巨大錯位時，回憶與楊振寧先生的相識與交往，對我們來說是意味深長的。

一 和楊振寧先生的相識與交往

楊先生識人極多，但他與流亡知識份子交朋友，應該不常見。文化大革命後期，1973年7月中旬中央電視台播出毛澤東接見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消息時，我們已北大畢業在基層工作，聽到楊振寧名字有一種怪怪的感覺。我們這一代人見證了中美兩國超越敵對冷戰意識形態的努力，如何由涓涓細流匯成時代浪潮。文革結束後，我們在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工作，青峰負責「人物評傳」專欄，曾到上海拜訪過楊先生的母親。楊母身材較小，挽髮髻，着中式衣，舉止靜氣從容，說話樸實坦誠，令青峰倍感親切難忘。當時我們並沒料到今後能與楊先生相識並長期交往。

1989年4月初，我們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開始為期半年的訪問。11日，所長陳方正請楊先生和我倆在沙田晚飯。我們第一次見楊先生吃飯聊天，便毫無拘束之感。飯後，楊先生談興未盡，又下樓喝飲料，聊到深夜12點。其時，山雨欲來風滿樓，話題自然集中在議論中國形勢發展的可能性上。楊先生曾撰文批判《河殤》是文化虛無主義，我們直言無諱地講了不同



左起：金觀濤、楊振寧、劉青峰、陳方正，攝於沙田，1989年4月11日。（圖片由劉青峰、金觀濤提供）

意此觀點。楊先生則說他贊同新權威主義。在他看來，中國解放十幾年就製造出原子彈氫彈，發展很快。在座四人誰都沒有想到幾天後耀邦先生去世，引發了中國和世界一連串大變局。從此，我們滯留香港，在中大工作近二十年。

1989到2008年我們在中大工作期間，楊先生經常回香港，那是我們與楊先生交往最多的時候。2008年我們從中大退休到台灣工作三年，見面較少。2012年春我們在北京租房住下，又能夠與楊先生夫婦見面吃飯聊天。直到2019年11月我們南下，不久疫情爆發，我們遷居深圳，就沒能再見到楊先生了。回想我們與楊先生三十年的交往，與楊先生的第一次見面長談，似乎確定了此後聚談的

模式：第一，吃飯聊天時間長，短則兩三小時，長則四五小時。第二，總是由楊先生主導話題，話題廣泛，從大陸時政、港台問題、中西文化和教育比較，到科學史及故舊回憶，等等。第三，交談中，楊先生與我們在中國政治、傳統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雖然觀點不同，分歧不小，但都能坦誠交談、爭辯而不傷和氣，始終維持輕鬆的氣氛。隨着時間流逝，楊先生和我們愈加珍惜這種和而不同的友好相聚。楊先生在2015年12月一次聚會後給我們的郵件，也許能表明這一點：“QF and GT, It was great that you visited us yesterday. At my age each get-together with old friends is a memorable event.”

楊先生認為，西方式的民主並不適合中國，經常公開為中國政府說話。他在不同場合強調，世界大國之中只有中國做到快速經濟起飛、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他認為這要歸功於共產黨以及從毛澤東到當今幾位中共領導人的正確領導和優良的中國傳統文化。楊先生也承認中國曾發生大躍進、大饑荒、文革乃至「六四」等不幸事件，但在他看來，將來歷史會認為這是中國起飛付出的必要代價。這些觀點當然會引起某些學者的反感。一位學者稱他是「天真的民族主義者」。

在我們和楊先生的交往中，確實能感覺到他那近於天真的民族主義情感。楊先生的這種感情中，包含着對父母之邦的骨肉親情和他年輕時經歷的抗戰苦難記憶。楊先生在〈父親和我〉（《二十一世紀》，1997年12月號）一文中描述了父親對他從小到大的決定性影響和深沉的父子之愛，使他在選擇中美兩國國籍時陷入感情上的兩難。他說，1964年他加入美國國籍是一個很痛苦的決定，對父親至死未原諒他而耿耿於懷；他也承認，2015年放棄美國國籍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他最後選擇了落葉歸根。他多次講，在1970年

代他父親一直勸他回國，而母親反對他回國的理由則非常簡單：我大清早出門排了好長時間隊才買到兩塊豆腐。楊先生對母親的親愛之情，往往不加掩飾地流露出來。1992年他在南開大學做演講談到自己母親時，忍不住失聲哽咽。

因與楊先生交往，我們也與楊先生的前後兩位夫人——杜致禮和翁帆女士相熟。2001年11月，青峰去清華探望楊先生，那時杜致禮患癌症已三年。楊先生帶青峰先參觀清華高等研究中心再到甲所午飯，剛就坐，致禮就由阿姨推着輪椅到餐廳打招呼並說：抱歉，我不能與你們一起吃飯了。這是青峰最後一次見到她。2002年暑假，楊先生邀我倆去他家，一起觀看名為“A Love Story”的短片。這部短片是楊先生在陪伴太太治病一年多期間，飽含對太太的深情和眷戀，邊學邊剪輯配音製作的。短片中的致禮，年輕時那麼美貌活潑，年老病弱時用助步器艱難挪步，始終充滿強韌的生命力。一年後杜致禮在美國病逝。

2004年12月，當我們聽到楊先生與小五十四歲的年輕姑娘訂婚消息時，十分驚訝。2014年楊先生翁帆夫婦與北京的朋友們吃飯時，楊先生說：我很幸運，一輩子沒吃甚麼苦，趕上了物理學發展的好時光，特別是十年前與翁帆結婚，這是上帝給我的最好禮物。楊先生與翁帆結婚自然引起社會關注和議論，楊先生不以為意，反而幽默地說：我與翁帆結婚，恐怕使得在國內認識我的人增加了一百倍，找我合照的人很多。2018年12月的一次飯局上，大家正議論某個話題，楊先生突然打斷並提問說，你們知道嗎？我的博士論文只寫了7、8頁，而翁帆的寫了180頁。一桌人大笑，祝翁帆順利通過答辯。現在，楊先生和翁帆親密無間、十指緊扣地走過了十八年，共同迎接楊先生百歲誕辰。

楊先生與我們的交往中，有一件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事。1996年我們獲得香港永久居留權後，按規定申辦回鄉證，至今都不明白是甚麼原因，觀濤的辦成了，而青峰的努力兩年也沒有辦成。1998年6月下旬，楊先生與我們在大學賓館——難忘在那裏可俯瞰吐露港山海之景——吃自助餐時，得知青峰的病需回北京做手術後，囑青峰寫兩頁簡明報告，他去疏通，說不一定能辦成。一個月後，中國旅行社通知青峰去辦回鄉證，10月凌鋒醫生在北京醫院為青峰做了成功的手術。我們自然非常感謝楊先生，他只淡淡地說了一句：這是我很高興做的事情。

楊先生很喜歡北島的詩和他出國後寫的散文，主動幫助北島回國探望生病住院的父親；北島到中大，也是楊先生幫他辦成了留港工作簽證。楊先生說，北島回家對中國沒壞處，對他個人有好處，為甚麼不去做呢？2000年8月楊先生訪問南京大學時，點名要見《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作者高華並一起吃飯，改善了高華在南大的處境。2000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楊先生給我們打電話說，你們有一本書在我這裏。我們一下子想不起來是甚麼書。他說，是高行健的《靈山》。楊先生沒有提到對《靈山》的評價，但我們了解他對中文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期望。

二 《二十一世紀》雜誌與楊先生

1989年秋冬之際，我們和中大朋友方正兄、金耀基兄以及其他同事，為了延續1980年代充滿活力的文化思想探討，決定創辦《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籌組了代表性廣泛的編委會，青峰擔任編輯。1990年6月方正兄出面邀請楊先生擔任刊物編委，楊先生沒有同意，但答應給予支持。楊先生在成為編委之前，相繼發表了〈二十世紀的物理學〉（1990年10月創刊號）、〈對稱和物理學〉（1991年8月號）和〈陳省身先生與我〉（1992年4月號）三篇影響深遠的文章，成為刊物的最重要作者。

1992年5月底的一天中午，楊先生突然來到我們辦公室，說他明天要去京津等地，來拿兩本新出版的《二十一世紀》4月號，該期有他的大作〈陳省身先生與我〉。楊先生告辭前與我倆拍照並說：《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愈來愈重要的刊物。1993年1月中旬，楊先生同意出任編委，當晚，方正兄在通識課後來我們家，觀濤倒五糧液，三人舉杯慶賀。楊先生第一次出席編委會就提出增設「科技訊息」欄，其後方正兄自告奮勇擔起了這個責任。欄目開出後，立即受到各地不同專業讀者的廣泛讚譽。在楊先生帶動下，先後有陳省身、李遠哲、王浩、徐立之、姚期智等世界著名的數理化、生物及計算機科學家加入編委會，對推動刊物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楊先生和我們，攝於中國文化研究所，1992年5月29日。（圖片由劉青峰、金觀濤提供）

楊先生為《二十一世紀》先後提供了十二篇稿件，其中有一半與數學物理學相關。除了上面提到的三篇外，還有〈美與物理學〉（1997年4月號）、〈沃納·海森堡（1901-1976）〉（2002年4月號）、〈愛因斯坦對二十一世紀理論物理學的影響〉（2004年6月號）。這六篇原稿是英文，先請譯者精心譯為中文，再由楊先生校閱潤色定稿。也許，只有楊先生這樣的大物理學家才能把深奧的

理論物理學，講得如此透徹明晰，使非專業讀者也能分享物理學之美，感知科學家在探索未知世界時內心的緊張神秘感和美的享受。

方正兄在為本刊寫的代發刊詞〈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1990年10月號）一文中說：「未來的世紀將是一個多元的世紀」，我們希望這份刊物「扮演的角色類似一所茶館、一個咖啡座，而不是一間教室、一座演講廳」。既然刊物是為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專業、不同立場的學者，提供思想交鋒和學術文化交流的開放平台，那麼，由於作者和編委們所持的觀念立場各有不同，對同一問題、特別是涉及與政治相關的問題上，看法往往相當對立，發生重大分歧也在所難免。

余英時先生作為積極支持刊物的創刊編委，在第二期「展望二十一世紀」欄目發表了〈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短論（1990年12月號）。文中說，「中國人自己在二十世紀造下的罪孽太深重了」，是由於邊緣人物「佔據了中心的地位、支配着中國的命運」，因此「從一部中國史來看，二十世紀是最混亂、最黑暗的時代」。十年後，2000年10月31日在編輯室召開的「世紀之交的回顧與前瞻：《二十一世紀》創刊十周年座談會」上，楊先生手持這篇文章複印件，公開質疑該文的觀點和立場，令在場學者搖頭愕然，也使他們事後難忘。

楊先生深知長期堅持辦一份非牟利的思想文化刊物，對中國的文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刊物籌辦初期，楊先生曾多次問這樣一個問題：一本很好但只辦一兩年的刊物，比起一個水平稍遜但能堅持十年的刊物，哪一個更有價值？青峰在1995年刊物出版五周年的「編者的話」（1995年10月號）中寫道：「楊振寧教授曾為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初步目標：最少要把《二十一世紀》辦到二十一世紀。不知不覺，這目標已完成一半了，但那其實也只能算是我們真正的起點而已。」2007年3月2日《二十一世紀》在沙田馬會「旺灣樓」舉辦了慶祝出刊百期的晚宴，青峰也正式卸下編輯重擔。楊先生在受邀講話中說，創



《二十一世紀》出刊百期晚宴，攝於沙田馬會，2007年3月2日。（圖片由劉青峰、金觀濤提供）

辦《二十一世紀》時，誰也不會想到今天中國的發展，我要活到參加慶祝刊物出版二百期。本期《二十一世紀》出版時，應該離楊先生的目標很近了。我們期待與楊先生一起參加這一聚會。

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王朝崩解，政權更迭，戰亂不已，社會思潮亦變幻迅捷。許多優秀的思想人文雜誌隨着潮湧而蜂起，又隨着潮落而夭折，在沙灘上留下貝殼，供後人拾起研究。即使在香港的大學，在體制約束和經濟緊縮壓力下，堅持辦《二十一世紀》這樣的刊物，也會遇到諸多困難。應該說，《二十一世紀》能堅持辦到今天，與方正兄、耀基兄的努力和楊先生以及去年病逝的余先生在關鍵時刻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三 科學、人文、宗教、民族主義及其他

正如楊先生的老友、著名數學物理學家戴森(Freeman Dyson)在〈楊振寧——保守的革命者〉一文指出的那樣，「楊教授是繼愛因斯坦和狄拉克(Dirac)之後，二十世紀物理學的卓越設計師」，而楊能做出這些卓越的貢獻，是出於「他對數學形式美的熱愛」，「楊對數學美的感受，照亮了他所有的工作」(《二十一世紀》，1999年8月號)。楊先生在〈美與物理學〉中是這樣談自己對數學和物理學之美的感受的：「牛頓的運動方程、麥克斯韋方程、愛因斯坦的狹義與廣義相對論方程、狄拉克方程、海森伯方程和其他五、六個方程是物理學理論架構的骨幹。……它們以極度濃縮的數學語言寫出了物理世界的基本結構，可以說它們是造物者的詩篇」；學物理的人面對這些方程的美的感受「是一種莊嚴感，一種神聖感，一種初窺宇宙奧秘的畏懼感」。至於為甚麼會這樣，楊先生說：「大家今天沒有很好的答案，恐怕永遠不會有，因為答案必須牽扯到宇宙觀、知識論和宗教信仰等難題。」

2002年4月中旬，方正兄邀楊先生和我倆在沙田馬會「凱旋廳」午飯聊天時，觀濤突然說要冒昧問楊先生一個敏感的私人問題，徵得同意後，觀濤問：你這一生中從來沒想過要信某一宗教嗎？楊先生回答：沒有。不過，我現在老了，也開始理解信教。記得1956年當我和同學聽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病逝前信了天主教，甚為驚訝。而現在，不再吃驚。楊先生接着說，前天有個記者提問：你認為科學和宗教是否相融？我的回答是：相融。因為科學的起源與宗教密不可分。只不過這幾百年科學擴張得太快，而宗教則萎縮了。但宗教永遠比科學更大，因為科學只面向自然世界。

還有一次，2006年3月在灣仔「杭州酒家」吃飯聊天時，耀基兄說起，錢穆先生曾說如果可以與三個古人對話，自己最想與朱熹、陶淵明和曾國藩談話；接着轉問楊先生最想對談的是哪三位？楊先生想了一下說：阿基米德(Archimedes)、牛頓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而最想問牛頓的，就是知識追求和宗教信仰的問題。他說自己年紀愈大，愈覺得宗教問題之深奧，科學之

有限性。可見，楊先生深知宗教和現代科學的關係是神秘而深刻的，內心始終保持着對宗教的敬意。

楊先生與我們聚會時，常常講他認識的美國和中國大科學家的往事，但很少講自己的理論貢獻。2018年12月，觀濤問了楊先生一個長期想問的問題：你年輕時提出楊-米爾斯(Yang-Mills)規範場，當時是否想到它對現代物理學發展會有如此巨大的影響？楊先生說，他也沒有料到。論文剛發表時沒有甚麼評論，也沒有人請他演講。幾年後哈佛大學請他演講時，他選講這個理論。1960年代後規範場開始受到重視。觀濤又問，你是否認為規範場論對統一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有意義？他說：當然是的。你沒有發現規範場方程和愛因斯坦引力場方程很相像嗎？

2017年7月趁方正兄來北京，我們和幾位朋友邀請楊先生翁帆夫婦歡聚，為楊先生九十五歲慶生祝壽。那天，楊先生興致很高地說：曾國藩講過人生有四大幸運：聰明、長壽、成功、太平；我享有其中三項，太平沒有，因為經歷了抗日戰爭。但最終看到了中國強大，還是很幸運的。他在感恩人生時，不禁又深情回憶起母親和清華園往事。

記得1989年7月，楊先生曾和我們在沙田麗豪酒店午飯聊天。難忘的是，他當時講話中心點是強調形勢再怎麼對中國不利，最重要的一點是，只要維持好中美關係，就能克服危機。他說，方勵之夫婦到美國使館避難事件可能會引發中美關係惡化，他還擔心各國對中國全面制裁。但三十年後楊先生對中美關係看法發生了極大變化。2019年11月我們即將離京南下，與兩位朋友去清華楊先生家拜訪，楊先生翁帆夫婦又請我們四人到清華甲所晚飯。此時美國總選大選已經拉開帷幕，特朗普(Donald J. Trump)以「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為口號，社會出現撕裂。觀濤問楊先生，現在中美關係出了些問題，你怎麼看？楊先生很肯定地回答：中美兩國競爭，不管特朗普是否當選總統，我肯定將來中國一定會贏。

楊先生作為科學史上重要物理學家，確實是中國人的驕傲。時光荏苒，在漫長的歲月中人們往往難以察覺自身的變化。在我們與楊先生的長期交往中，深感隨着楊先生年紀愈來愈大，他的民族感情和愛國情懷也愈來愈強烈。也許，這再一次說明：科學的追求並不能成為人生的終極關懷。其實，如果以韋伯太空望遠鏡那種宇宙的眼光來思考，和星空之壯麗及宇宙奧密相比，人類經歷的一切多麼微不足道。

我們衷心祝賀楊先生百歲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劉青峰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創刊編輯。

金觀濤 中國美術學院南山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高級名譽研究員。